

# 中国古籍丛书概说

刘尚恒

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，丛书是一宗刊刻数量相当大的专类图书。据估计，我国从雕版印刷术发明到辛亥革命为止，现存古代典籍约有十五万种之多，而丛书一类所收约有五万种（其中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的子目 38891 种；未收的佛藏汇刻及新式丛书，以及待补入的丛书，其子目估计一万种），占整个古代典籍的三分之一<sup>①</sup>，它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科学的重要资料。因此研究丛书，对研究我国古代典籍，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，无疑将是十分有意义的。

## 一、丛书的观念和起源

什么叫专类丛书，起源于什么时间？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清钱大昕以为丛书是“荟粹古人书，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，始于左禹锡《百川学海》”<sup>②</sup>。

清王鸣盛以“取前人零碎著述，难以单行者汇刻为丛书，其在宋则石庐龚士高有《五子合刻》，鄞山左圭禹锡有《百川学海》……。”<sup>③</sup>

清法式善说：“考丛书古无刻者，宋温陵曾慥始集《类说》，自《穆天子传》以下二百五十种，并录原文及撰人系历，是为丛书之祖。”④

清李调元说：“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，而别题一总名者。唯隋志载《地理书》一百四十九卷，目录一卷，又载《地记》二百五十二卷，是为丛书之祖。”⑤

清缪荃孙则以“取各书之全者，并序跋不遗”者为丛书，并说：“前人以左圭《百川学海》为丛书之祖。顾《学海》刻于咸淳癸酉年，先七十余年，已有《儒学警悟》一书，俞鼎孙、俞经编，计七集四十卷”⑥。

近人汪辟疆说：“总聚众书而为书者，谓之丛书。顾丛书之名，至唐宋而始著，丛书之制在周汉已开，《乐正》四术，《诗》存三经，《书》有六体之殊，《易》有十翼之作，丛书之源，远肇于此”⑦。

近人姚名达则说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者，上古之丛书也”，又说：“纵使不敢主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为丛书之说，岂汉志所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、杨雄所序三十篇亦不敢认为个人自著丛书之始乎？”他批评“近人推溯丛书之源仅及宋末，此其暗陋，抑可笑也”，“钱大昕、顾修之说为断流忘源也”⑧。

近人叶德辉以为“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，……宋人《儒学警悟》、《百川学海》二者为丛书之滥觞”⑨。

上海图书馆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说：“丛书是汇集许多重要或难得的著作为一书”。“我国最早的丛书是俞鼎孙、俞经的《儒学警悟》，辑成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(1202)”⑩。

等等。这些歧义殊说的出现，是由于对丛书的产生缺乏深入考察造成的。

谈到丛书的产生，谢国桢先生有个很好的见解。他说：“余恒以丛书之名盖由类书演变而成者也。类书中，宋有曾慥《类说》一书，

……汇集古今著述约数十余种，然皆删节不全，此已肇丛书之端。至元陶宗仪《说郛》，近人汇刻书目，始列入丛书，而《四库提要》则列入子部杂家杂纂之属，其书虽在宋左圭《百川学海》之后，而其体例实可窥见丛书与类书演变之迹”<sup>①</sup>。可惜谢先生未作进一步论证。

类书与丛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，都直接取材于众书，且内容庞杂（与所谓子部杂家类的杂学杂纂如唐魏征《群书治要》不同，它们的内容未经过编纂者加工），所不同的是，类书多有特定的编纂体例，或以分类，或以韵目，以便于按图索骥，而丛书无这一编纂体例，不供人作按图索骥地查找，所以前者属工具书，后者属阅读书。我们试将《类说》和《说郛》都共同收录的《番禺杂记》加以比较，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内容相同而体例有别。《类说》将其列为“五羊”、“瘴母”、“鬼市”三词目，下列原文。《说郛》则不标词目，直录原文。然而《类说》的编排是以所收录书书名为纲，下列词目，兼而有类书、丛书二种体例特色，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丛书从类书中脱胎而来的痕迹。

类书始于魏（公元二世纪初）时《皇览》，这是一部由儒臣们为魏文帝“稽查考核”而编纂的书。而丛书的出现较类书晚得多了，大多数人认为是在十三世纪初，因为这时候，一方面学术著述（即图书）较以前成若干倍地产生，另一方面雕版印刷、活字印刷术的发明，为图书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，人们需要的书多了，并且也较前容易得到，象过去那样依靠手抄摘编汇纂诸书的办法已经不敷应用，于是依靠印刷术直接汇编诸书的方式便应运而生，这就是丛书的产生。

前人关于丛书概念的不同说法，有的执广义概念，有的执狭义概念，取其一端，顾此失彼，自然既有合理部分，也有不尽合理部分。钱大昕指出丛书的“荟粹”性质，这是合理的，但不一定非“古

人之书”不可；王鸣盛之说中“汇刻”是对的，然而也不尽是“零碎著述，难以单行者”；法式善把《类说》当作“丛书之祖”，强调了它以书为纲的编纂体例，而忽略了另拟词目的体例；缪荃孙从丛书所收书的完整性来确定，则界限过去狭窄；汪辟疆强调总聚，却把同一著作的不同注释、解释的总聚也当作丛书（如《十翼》不过是对《易》的解释）；姚名达则又把篇的总聚当作丛书（如《诗》本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）；叶德辉之说，既考虑到总聚（“并括”），又考虑到丛脞（“举四部”），较之他的前人合理得多，但不一定每部丛书非“举四部”（即经、史、子、集）不可，包括二部、三部也是可以的；上海馆之说，则侧重于从丛书的功用上下定义，至于汇集的是否所谓“重要或难得的著作物”，那是因编纂者而异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
我以为丛书的概念有二，从广义上讲，就是汇集两种以上专书别题一书名而成另一新的著作物；从狭义上讲，其所汇集的两种以上专书，不但要首尾完整，而且内容上必须超过两个部类以上，这样才既包含总聚的意思，又包含细碎丛脞的意思。这样的狭义的概念才是丛书的本义。可是人们往往不区分广义和狭义概念，而常以广义概念代替狭义概念，所以后来把丛书又叫做汇刻书、丛刻、丛刊（至于按一定期限连续出版的期刊，也有称作丛刊的，则另作别论）。

为什么说丛书的狭义概念才是丛书的本义呢？这首先从“丛书”两字的含义看。

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丛，聚也”。《尚书·无逸》有：“是从于厥身”。《尚书·益稷》有“元首丛脞哉”，汉马融注：“丛，总也”。《后汉书·冯衍传下》有：“恶丛巧之乱世兮”，唐李贤注：“丛，细也”。可见丛字的含义，一是总聚，一是细碎、烦琐的意思。

丛书两字连用在一起，首见于唐韩愈的《剥啄行》一诗，诗云：“门以两版，丛书于间”<sup>⑫</sup>。但这并不是书名，而是说关上门，家中

聚集着许多书可读。第一次用作书名的是唐陆龟蒙的《笠泽丛书》，其序云：“丛书者，丛脞之书也。丛脞，犹细碎不遗大，可知其所容也”。可见这是陆氏诗文杂著，而以其书丛脞细碎，遂以丛书名之，故《唐书·艺文志》取其书入丁部集录之别集类。到了宋代，王楙有《野客丛书》，其序云：“仆间以管见，随意而书，积数年间卷帙俱满，旅寓高沙，始命笔吏，不暇论次，总而录之为三十卷。”可见这是陆氏有关考订辨证的杂著，故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取其书入子部小说家类。陆、王二人所用的丛字，均取细碎丛脞的意思。

其次，从丛书在中国目录学上的立类来看。

从汉刘向、刘歆父子的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起，我国公私家目录著作代不匮乏，然而给丛书门列类目，却是在明代后期。陆、任二书都已失传，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注来看，属于史部地理。五代的《五经》，北宋的《七经正义》、南宋初井度的《眉山七史》也都各入其类。《儒学警悟》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列在子类类事类（即相当于后来的子部类书类）。元陶宗仪的《说郛》，《元史·艺文志》列在子部小说家类。可见明万历以前，对于汇集诸书为一书这种类型，并不如后人以丛书来认识的。万历以后，丛书开始列类，首见于祁承燾的《澹生堂书目》，然而祁目之后的许多公私家目录著作仍不列丛书目，一直到清乾隆年间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还是把丛书列在子部杂家类。这显然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把丛书当作一种新的出版物类型、新的著作物类型来认识，不承认丛书类目。丛书类目的确定，还推清末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，张氏以为丛书“其中经、史、子、集皆有，势难隶于四部，故别为类”，所以在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外，另列丛书目，五项并列，由传统的“四分法”衍变成“五分法”了，这是具有创见的。自此以后，公私家书目多有丛书类目，或隶于子部，或隶于总类。

由此可见，汇集诸书为一书被当作一种新的出版物类型、新的

著作物来认识，祁承燦是第一人，清乾嘉时期的顾广圻、李调元、王鸣盛，法式善进一步作了阐述，而张之洞则大加推崇、大加提倡。这说明，一方面是明万历以后丛书刊刻数量日趋繁多，特别是乾嘉以后；另一方面是名实具备的丛书出现以后，才引起人们重视的。所以把丛书的起源推溯过早的说法，是既不符合丛书本义，也不符合人们认识实际的。

因此，从丛书的狭义概念来考虑，我国最早的丛书确实当推《儒学警悟》（前人因《儒学警悟》未发现之前，推《百川学海》为最早，是无可非议的），是书卷一至十为宋汪应辰的《石林燕语辨》十卷，卷十一至十六为宋程大昌的《演繁露》六卷，卷十七至二十一为宋马永卿的《懒真子录》五卷，卷二十二至三十一为程大昌的《考古编》十卷，卷三十二至三十九为宋陈善的《扞虱新话》上集四卷下集四卷，卷四十上下为宋俞成的《萤雪丛说》二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一该书既有汇集者统一重编的卷数，又有子书作者原编卷数，合为一书，分为诸书。第二汇集子书的性质为两大部类（即《石林燕语辨》为史部政书，其余为子部杂学）。完全符合具有总聚丛脞的丛书本义。如果从丛书的广义概念出发，那末南齐陆澄的《地理书》，集《山海经》以来一百六十家著作，梁代任昉又增补为《地记》二百五十二卷，便是最早的地理丛书。

## 二、丛书发展简述

继《儒学警悟》之后，宋代的第二部丛书便是左圭的《百川学海》，是书以天干为序，凡十集，每集七、八种至十余种不等，计一百种一百七十九卷，所收以唐宋人著述为多，间有晋代及六朝人著述。

元代有陶宗仪的《说郛》，是书陶氏原编的种数、卷数已不可

知,传世的一为明代传抄的一百卷本(近人张宗祥重校的《说郛》也为一百卷,即商务印书馆铅印本),一为顺治间陶珽校编的一百二十卷本(即宛委山堂刻本)。从流传的抄本和刻本看,它收集经史传记,下迨百氏杂记之书,凡千余种,然而其所集的子书多经删节,只录一卷,正因为它没有做到首尾完整,序跋不遗,因此后人也有不以它为丛书的。

到了明代,丛书才有了大的发展,其原因一是明代社会较宋元时期稳定,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,经济上超过前代,这给丛书的大量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;二是明代士大夫中多有藏书、刻书的风气,这就促使丛书大量出现。如果说,唐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,宋有丛书之实而无丛书之名,那末明代便有了名实具备的丛书了。

明代丛书大体在嘉靖、万历前,沿着《百川学海》、元《说郛》的体例,汇纂越来越庞杂。如吴永的《续百川学海》、冯可宾的《广百川海》,本身就是续编、续刊性质。其它如陆楫的《古今说海》、范钦的《范氏二十一种奇书》、高鸣凤的《今献汇言》、王文禄的《百陵学山》、吴琯的《古今逸史》等,也都仿照《百川学海》和《说郛》的体例,多以汇集子部杂著为限。万历以后,除了在所收子目增多、篇幅增大外,还出现新的丛书类型,如汇集某一历史时期著述的有程荣的《汉魏丛书》(为第一部名实具备的丛书)、钟人杰的《唐宋丛书》(其中虽有元人著述二种,然而序云:“五代故唐之残局,而辽金元皆宋之遗疹”,则可视为编者的一家言)、赵标的《三代遗书》;汇集专门部类的丛书有周子义等《子汇》、顾元庆的《顾氏文房小说》、桃溪居士的《五朝小说》;汇集某一地方著述的有樊维城的《盐邑志林》等。

但是,如清黄丕烈指出的:“明人喜刻书,而不肯守其旧,故所刻往往戾于古”<sup>③</sup>,这种恶习也反映在丛书中,如商浚的《稗海》,将

宋叶梦得《巖下放言》节录后改题郑景生的《蒙斋笔谈》，书名、作者面目全非；胡文焕的《格致丛书》所收的《洗冤录》，殊多脱误，且改易卷第；陈继儒的《宝颜堂秘籍》将王楙的《野客丛书》三十卷，改为十二卷，凡精核之处，多遭删削；钟惺的《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》，摘《困学纪闻》中论诗之语，题《困学论诗》，摘《玉海》中诗门，题《玉海诗纪》，摘《文献通考》论诗数段，题《文献诗考》。至于如明末清初毛晋父子所刻的《津逮秘书》、《宋名家词》等，足以称道的也不少。

清代是我国丛书刊刻的鼎盛时期，其数量之多、种类之全，远胜明代。大体上可分作三个时期，即一清代前期（顺、康、雍三朝），此时由于统治者文网严密，学者多在故纸堆中讨生活，丛书的刊刻也以汇集经史书籍为多，如张潮的《昭代丛书》、曹溶的《学海堂类编》，纳兰性德的《通志堂经解》、张伯行的《正谊堂全书》、曹寅的《楝亭十二种》、陈湖逸士的《荆驼逸史》、顾炎武的《音学五书》、张士俊的《泽存堂五种》等。二是清代中期（乾、嘉及道光前期），此时统治者文网渐弛，考据学大兴，丛书门类繁多，有新疏之群经，精校之古子，重辑之佚书，审订之雅记，纷然杂陈。著名的有张海鹏的《学津讨原》、《墨海金壶》，黄丕烈的《士礼居丛书》，鲍廷博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毕沅的《经训堂丛书》，孙星衍的《平津馆丛书》、《岱南阁丛书》，阮元的《学海堂经解》，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。特别是乾隆年间内府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，广搜群籍，部头之大前所未有。《四库全书》收书 3503 种，79337 卷。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收书 138 种，2411 卷。三是清代后期（鸦片战争以后），此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，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反映到丛书刊刻上，一部分是仍沿袭乾嘉学风之余波，以汇刻校勘古籍为重，如蒋光煦《别下斋丛书》，钱熙祚的《守山阁丛书》、《珠丛别录》、《指海》，伍崇曜的《粤雅堂丛书》，潘仕诚的《海山

仙馆丛书》，胡珽的《琳琅秘室丛书》，钱培名的《小万卷楼丛书》，王懿荣的《天壤阁丛书》，潘祖荫的《滂喜斋丛书》，《功顺堂丛书》等等。另一部分向更加专门发展，出现了舆地、金石、目录、词曲丛书，以及反西学东渐的和近代科学丛书，如陈运溶的《麓山精舍丛书》，《浙江图书馆丛书》（一名《蓬莱轩地理学丛书》），王蕴香的《域外丛书》，江标的《灵鹫阁丛书》，叶德辉的《观古堂书目丛刊》，罗振玉的《楚雨楼丛书》，吴梅的《奢摩他室曲丛》等。

清代丛书有两点值得注意，一是很多丛书的编纂者或是藏书家，或是校勘家，或是某一学科的学者。所以他们刊刻的丛书，有的以汇集、辑佚为主（如《学津讨原》、《守山阁丛书》），有的以仿刻宋元旧本为主（如《士礼居丛书》、《岱南阁丛书》），有的以校勘精审为主（如《抱经堂丛书》、《经训堂丛书》）。因此清代丛书质量远远超过明代。二是有些丛书书名、编纂者虽各不相同，但其书同出一个版本源流，如明末毛晋的《津逮秘书》（其原版为胡震亨的《秘册汇函》）版片至清散佚，为张海鹏所得，张氏据此刻印《学津讨原》、《墨海金壶》、《借月山房汇钞》，后来“借月”版片为陈璜所得，陈氏据此刻印《泽古斋重钞》，《墨海金壶》版片为钱熙祚所得，钱氏据此刻印《守山阁丛书》，陈璜所得“借月”版片，后又归于钱熙祚，钱氏重加校补，刻印为《指海》。

民国以后，丛书刊刻门类也繁多，数量也不少，但是鱼龙相混，高下杂陈，其间可观者当首推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丛书集成》。

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辑的《四部丛刊》初印于1919年，收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书323种，是一部影印宋元旧本和明清精刻精抄本、包罗宏富的大丛书（其中宋本39，金本2，元本18，影写元本5，校本5，朝鲜本4），它将过去不易为人们常见的宋元精刻汇于一集，为人们校勘旧籍提供极大方便。后来又继续搜集，于1934

年又印成《四部丛刊续编》，收书 81 种，1935 至 1936 年又印成《四部丛刊三编》，收书 73 种。

紧接《四部丛刊三编》印行后，中华书局辑印了《四部备要》，集经、史、子、集书 335 种，以仿宋体铅字排印。

商务印书馆后又于 1935 至 1937 年辑印成《丛书集成》，汇集宋至清代一百种各类丛书所收子书，原约六千余种，剔其重复存 4107 种，大多数重行排版，并加句读，少数为影印，实际出书为 3111 种，占整数的十分之九。

如果说《丛刊》以“罕见”为主，《备要》以“实用”为主，那么《集成》则兼而有之。总之这三部近代大丛书的出版，是对我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传播的一个极大贡献。

### 三、丛书的价值和利用

丛书不仅在数量上占我国古代典籍的三分之一，而且在学术内容上、资料价值上更是重要的三分之一，大体上我国古代的各类重要著述均收录在丛书里。因此，丛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科学的重要资料来源。

清末张之洞在《书目答问》里，对丛书的价值作了精辟地概述。他说：“丛书最便学者，为其一部之中，可该群籍，搜残存佚，为功尤巨”，并且劝人“欲多读古书，非买丛书不可。”张氏之言颇为地道的。

丛书以其网罗宏富远胜单刻本，大至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以及社会风俗、科技之书，细而琐事异闻、茶酒志怪之事，无不可于丛书中求之，特别是许多被旧时文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“雕虫小技”，从无单刻的机会，而以丛书形式流传至今，往往寻求一些不著名的诗文别集、唐宋以下复杂繁多的说部，则无丛书不可。所以丛书对于

方便学者,保存古代文化和古籍的流传,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。试举其萃萃大者分述如下:

第一,汇集的功用。丛书把单种图书汇集在一起,少则两种(如明俞安期的《庄骚合刻》),多至数千种(如《丛书集成》)。这种汇集既为我国古代典籍的流传作出贡献,又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,省去了东找西寻的麻烦,甚至不知何求的苦恼。特别是汇集某一部类、某一学科的专类丛书,尤便于学者。譬如一个中型图书馆,或者某一学者,如果备有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丛书集成》这三部大丛书,那么读者或他本人研究我国古代一般问题所需要的图书,大体上可以解决百分之七、八十。再譬如一个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人,如果具备《音学五书》、《棟亭五书》、《小学汇函》、《许学丛书》,那末基本上可以不外求。至于那些从无单本行世的丛书,则舍丛书无求。如我国最早研究水稻的专著明黄省曾的《稻品》,从无单刻本,但在《广百川学海》、《百陵学山》、《夷门广牍》以及近代的《丛书集成》里均有收录。还有的书,虽曾有单刻本行世,但现已流传稀少,罕为人见了,而在丛书里却为人们常见,如宋唐积的《歙州砚谱》和宋米芾的《砚史》,虽然前者有明华氏刻本,后者有宋刻本,但能见到的机会实在太少,而此二书在《百川学海》、《学津讨原》、《说郭》、《美术丛书》中均有收录,便成了易得之物。

第二,辑佚的功用。古代典籍经过长期人为或自然毁坏,有的名存实亡,有的则名亡实存,于是后代的许多学者从类书或其它著作中考求佚文,掇拾补录,重新辑出,刊刻在丛书里,这对恢复古代典籍的原貌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如苏轼之子苏过的《斜川集》,南宋已稀,清康熙时下诏也求之不得。据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说,康熙八年,闻有书贾持此书求索,索价二百金,“惜未得见之,其存佚今不可知”。可是乾隆年间历城周永年从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,厘为六卷,嘉庆间的法式善又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佚事二卷,首刊于鲍廷

博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二十六集,后来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丛书集成》均有收录。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《斜川集》,它虽不全同原貌(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文献通考》著录为十卷本),但应是原书的百分之八十了,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因为从元末到清初,常有书贾作假,将宋刘过的《龙洲集》改题为《斜川集》,以二人皆名“过”而欺世,贻误很多学者。后人能见到《斜川集》的真实面貌,这是丛书刊刻的一大功绩。特别是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仅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经部书66种,史部41种,子部103种,集部175种,共计375种,4926卷,而《聚珍版丛书》则是专门汇集儒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佚的罕见书。后来还有专门汇集辑佚书的丛书,如黄奭的《汉学堂经解》(一名《黄氏逸书考》),收《汉学堂经解》112种、《通德堂经解》17种、《通纬》72种、《子史钩沉》84种,合计为385种。王谟的《汉魏遗书钞》收书400余种。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收书多达617种,特别是马氏这位家贫而勤奋的学者,他“广引博征,自群经注疏音义,旁及史传类书,片辞复字,罔弗搜辑”<sup>①</sup>。其它如张澍的《二酉堂丛书》、茆泮林的《十种古逸书》、孙冯翼的《问经堂丛书》等,都是以专门汇集辑佚书而著称。这些辑佚书遍及四部,为我们提供新的书源。

第三,提供精本、善本。一部古代著述流传至今,中间经过多次传抄、刻印,产生不同的版本。一般地说,越是离著者时代近的早期本子越可靠,所以前人重视宋元旧刻的道理也就在这里(当然一把宋元旧刻当作古董欣赏,一味地唯宋元旧刻称是,即所谓“佞宋”者,也不对),但是越是早期的本子,流传的也越稀、越罕见,即使有幸存的几部,藏书家也常秘不示人。嘉庆年间一些著名学者如钱大昕、卢文弨、黄丕烈、顾广圻等人,偶尔在朋友处看到一部宋版书,便严肃认真地在册尾写下跋语,留下“某年某月某日,某某敬观”,或者钤上“某某过眼”印记,当作一生最大的眼福。即使在今天,

能够见到宋元旧刻的机会和人还是很少的。但在毛晋的《津逮秘书》、黄丕烈的《士礼居丛书》里就收有据宋元旧本刻印的图书，特别是近代印刷术的发展，影印图书出现（或与原本大小相同，或缩小原本），其字体、行款一如原书，使用价值与原书相等。这就使旧时学者们见不到宋元旧刻，现在都可以方便地看到，如丛书中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、《四部丛刊》、《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》、《古逸丛书》、《续古逸丛书》等，都收录了大量的宋元旧刻的影印本。

还有的书在多次传抄、刻印过程中产生脱漏删节现象，后人在汇为丛书时重加校勘，这样的丛书本就远胜单刻了。特别是清代很多经过著名藏书家、校勘家、学者编纂的丛书，其文献价值更高。如黄丕烈的《士礼居丛书》、孙星衍的《岱南阁丛书》、卢文弨的《抱经堂丛书》、鲍廷博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。有的丛书编纂者还延请当代的名家参予校勘。如卢见曾的《雅雨堂丛书》出自惠栋之手，吴騫的《拜经楼丛书》、毕沅的《经训堂丛书》出自江声、孙星衍、钱坫之手，孙星衍的《平津馆丛书》多出自顾广圻之手，钱熙祚的《守山阁丛书》出自于张文虎之手。利用这些经过名家精校审择的丛书，也就获得了前人校勘、研究成果，走了捷径。

第四，普及的功用。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的录书原则是“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”，对于诸如“无从购求者不录”。可见张氏推崇丛书不仅在于“易读”，而且在于“易买”。丛书包括多种书，备置一部丛书等于买了一批书。即使在今天，丛书本的价格也低于单刻本。现在我们在古旧书店里仍能看到大量的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丛书集成》中零本堆满书架，甚至象明汪士贤刻的《汉魏六朝诸名家集》、商浚的《稗海》零本，仍然屡见不鲜，而明代单刻本图书则已成了稀见的凤毛麟角了。所以丛书对于古籍的广为流传和读书人获得图书提供方便条件。

丛书由于它在古代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为人们所重视。为

了利用好丛书，自然很重视丛书目录的编制工作，因此，掌握丛书目录便是掌握丛书的钥匙。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是嘉庆年间顾修编的《汇刻书目》。顾氏从广义概念出发，把丛书称作汇刻书，是很具卓见的。它收丛书 261 种，以丛书名为纲，下著录刊刻人（编纂者），并列子目书名、卷数、作者于下，对于了解某一丛书比较方便，但因编者随手摘录而成，故无法检索。自顾氏之后，相继增补、续编、新编的不下二十余种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，光绪二年傅云龙续编、胡俊章补遗的《续汇刻书目》，收丛书 500 种，首以四库总目分类。1928 年沈乾一的《丛书书目汇编》收丛书 2200 种，首创辞典式编排法。1930 至 35 年金步瀛的《丛书子目索引》，收丛书 400 种，首创子目书名索引法，以子目为纲，而注其著者及所属丛书名。1935 年曹祖彬的《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》，首创以子目著者索引法，以子目著者为纲，而注其子目书目及所属丛书名。1935 年杨家骆的《丛书大辞典》，收丛书多达 6000 种，以丛书名、子目书名、子目著者为纲，混合编排，依四角号码为序。所以总的说来，所收丛书越来越多，检索越来越方便，体例也越来越完备。

1959 年上海图书馆编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这部《综录》吸收旧时各种汇刻书目的长处，并加以发展。《综录》共分三巨册，第一册为丛书书名的《总目分类目录》，收丛书 2707 种，以其所订分类表分类，附《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》、《丛书书名索引》（以四角号码编排）、《索引字头笔划检字》。第二册为丛书的《子目分类目录》，计子目七万多条，38891 种（其中一书为两种以上丛书所收的，均经比勘同异，分别作一种或数种处理），以子目为单位，按四库分类，部下析为类属，末附《别录》（即《二级丛书目录》）。第三册为《子目书名索引》和《子目著者索引》（均以四角号码编排），首附《索引字头笔划检字》、《索引字头拼音检字》。有了这部《综录》，旧时的汇刻书目基本可以置之不顾了，

读者无论从丛书书名、子目书名、子目著者的任一角度，都可以得心应手地检索，而且它附的《收藏情况表》，指明收藏单位，起了联合目录的作用。总之，这部《综录》是解放以来我国编纂的大型工具书之一，它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稿

一九八〇年十月修改

## 注

- ①杨殿珣《谈谈古笈和古笈分类》，《北图通讯》1979年第一期。
- ②清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《跋百川学海》。
- ③清王鸣盛《蛾术编》卷十四《合刻丛书》。
- ④清法式善《陶庐杂识》卷四。
- ⑤清李调元《童山文集》卷三《函海后序》。
- ⑥缪荃孙《儒学警悟序》。
- ⑦汪辟疆《目录学研究》96页，1955年中华书局。
- ⑧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378页，1959年中华书局。
- ⑨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221页，1959年中华书局。
- ⑩上海图书馆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前言。
- ⑪谢国桢《丛书刊刻源流考》，载《明清笔记谈丛》202页，1960年中华书局。
- ⑫唐韩愈《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》卷四古诗。
- ⑬清黄丕烈《校元本宋提刑〈洗冤录〉》。
- ⑭清匡源《玉函山房辑佚书·序》。